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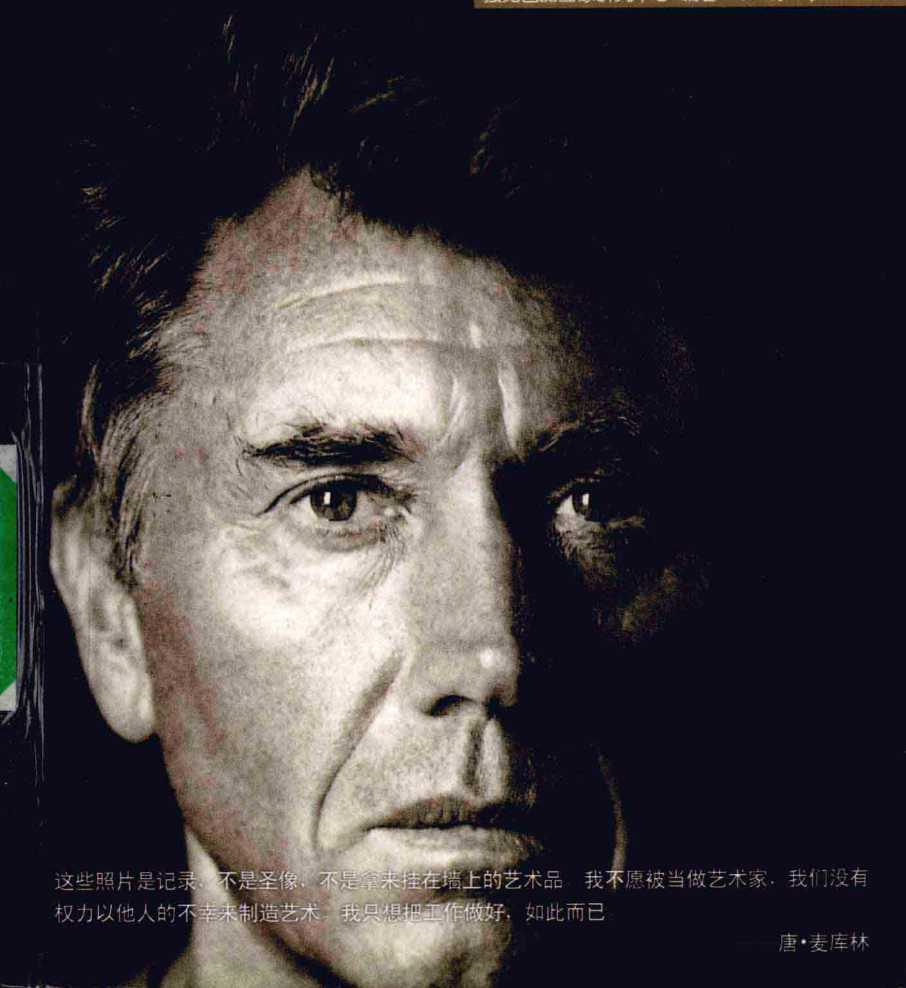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

Donald McCullin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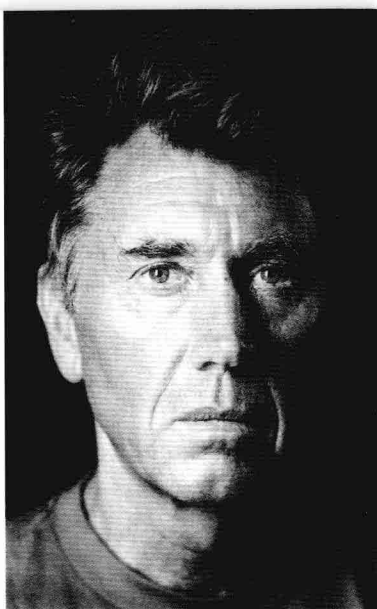
唐·麦库林

独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编著 / 汕头大学出版社



这些照片是记录，不是圣像，不是拿来挂在墙上的艺术品。我不愿被当做艺术家，我们没有权力以他人的不幸来制造艺术。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如此而已。

——唐·麦库林



唐·麦库林

Don McCullin

|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作品集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唐·麦库林

编 著 / 独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 胡开祥

封面设计 / 郭 炜

设计制作 / 北京时代印象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责任出版 / 林 琦

责任技编 / 姚健燕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 30 千字

开 本 / 787 × 960 1/32 印 张 / 3.75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000

定 价 / 全套 100.00 (共 5 册), 本册 20.00 元

ISBN 7-81036-954-7/J · 72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5 室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103-6001 邮编 / 510075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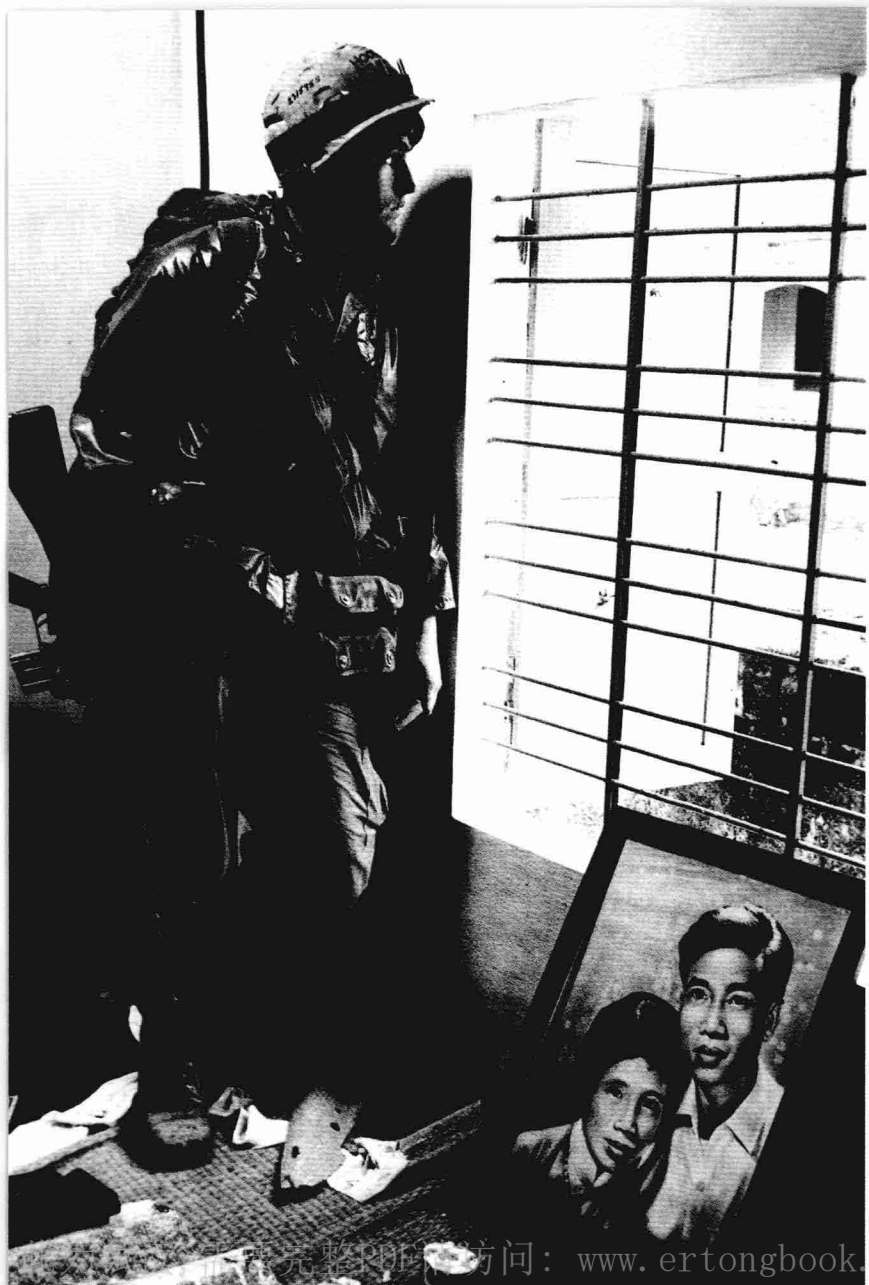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这些照片是记录，不是圣像，不是拿来挂在墙上的艺术品。我不愿被当做艺术家，**我们没有权力以他人的不幸来制造艺术。**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如此而已。

——唐·麦库林



乱世影像的采撷者

唐·麦库林 (Don McCullin), 1935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工人家庭。1948 年, 他获得商业艺术奖学金, 得以在伦敦哈默史密斯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绘画。1950 年, 由于父亲突然去世, 家境困难的麦库林不得不离开学校, 先是在铁路上卖面包, 然后到拉金斯的动画工作室从事卡通绘制的工作。1953 年, 急于想离家出走的麦库林应征入伍, 在中东和地中海英国皇家空军服役, 随部队驻守埃及、东非、塞浦路斯等国家和地区。他的主要工作, 是在航空侦察洗印处当一名摄影助理。这让他有机会熟悉并掌握了摄影的操作技术和暗房技巧, 并且机会接触到航拍摄影。期间, 他买得自己的第一台罗莱弗莱克斯相机, 并从事业余拍照活动。1956 年退役后, 他重新回到拉金斯动画工作室从事卡通片的绘制和暗房洗印工作。

生活依然困难无聊的麦库林, 成天与那些浪迹街头的黑社会分子厮混在一起, 并用自己的相机为他们拍摄一些装模作样的生活照片。这一时期, 麦库林业余拍摄的照片, 已经显露出对一些极端危险的人物及事件的强烈兴趣, 也显露出自己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和直入人物以及事件核心的穿透力。当一个警察在黑社会势力范围内被杀的恶性事件发生后, 他拍下的一张照片被《观察》杂志主编看中, 并得以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一张照片。此后他又继续拍摄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个专题的图片。1961 年, 他开始作为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 为《观察》杂志拍摄图片。

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柏林墙建立的图片报道，这让他声名远扬。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从此“机会不断地涌向我”，“成功来得太容易了！”他的照片很快被发表在诸如《生活》、《时代周刊》、《巴黎竞赛画报》、《明镜》这样世界一流的杂志上。1964年以后，他一直是《伦敦周日时报》的专职摄影家。1967年，他成为由卡帕、布列松等人创立的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此后，他被派往世界各地，在刚果、柬埔寨、越南、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和北爱尔兰等地，拍摄了整个冷战时期，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战争和重大的地区性武装冲突。

作为一个战地记者，麦库林延续了自卡帕以来的战地摄影的传统：无畏的牺牲精神，直入危险境地的过人勇气，通过拍摄战争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来显现和嘲弄战争本身，以及表达对战争过程中被权力阶层宣扬的英雄主义的鄙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已经从自己拍摄的这些图片中获得了相当优厚的报酬和荣誉。但是，看到那些在动荡中苟活着的平民悲惨的生活境况，看到那里的饥谨和死亡，他对生活在平静的国度和环境中持有的价值观，甚至对战地摄影本身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当他赴尼日利亚拍摄那里发生的武装冲突时，他说：“我被那里的情况吓坏了，精神几乎崩溃了。900名儿童生活在一个营地，这是一个极其肮脏的环境，儿童们在垂死中挣扎。它完全改变了我对战争的态度，这里不应有任何的冒险和所谓的英雄们的舞台，我不能把这里的经历和我所知的家庭生活联系和统一在一起，我失去了所有拍摄战争的兴趣，只想去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自己同胞的种种不人道的残忍行为。”

但是，除了看到无数媒体通过发表这些残酷的乱世图像而赢得无数人的注意大赚其钱之外，除了看到自己的收入越来越多之外，麦库林看不到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止战争和那些惨剧的继续发生。“我把这些历史画面记录下来，希望一切不会再发生。但这些曾经发生过，以后也会继续发生。我不再生活在幻影中。人类会一直遭受苦难直到时间的尽头。”这种残酷的战争真实让麦库林对自己所从事的战地摄影的工

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一再检讨自己的战地摄影记者的身份，检讨自己的动机，检讨自己过度喜欢将那些悲惨的场景拍成尤金·史密斯式的素质考究的圣像，是不是一种虚伪和别一种方式的对他人的伤害与残忍。

1984年，他不再涉足战场去拍摄那些给他带来丰厚收入和荣耀的图像。他希望自己过一种平静真实的生活。他已经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和混乱，而他对此却又无能为力。但远离这一切并不那么容易。当他远离战争回到家乡萨默塞特，过一段短暂的宁静生活时，亲临无数战场所看到的那些凄凉而悲惨的景象成为头脑之中挥之不去的恶梦般的记忆。正如他所说的：“我承认我心中充满了忧郁和不安全感。我脑中萦绕对死亡的想象、毁灭以及触目惊心的梦魇。”“我试图忘记过去。那些底片都整齐地放在我的书架上，而我却生活在那些战争的可怕情景中。我整天呆在院子里，试图捕捉生活中那些还能令我高兴的事物。”在清晨或者黄昏，麦库林在家乡萨默塞特偶然拍拍风景和静物，借以休养恢复疲惫已极的身体，平息动荡不安的内心。但在暗室中，他会不由自主地把照片洗得灰暗压抑。他甚至被朋友怀疑有严重的精神病。

尽管如此，麦库林并没有失去他一贯的锐气。摄影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与这个世界建立必要关联的重要媒介，甚至成为他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他说的那样：“我一直认为不是我拥有那些照片，而是它们拥有我。它们给我生命，一个不可重复的生命。我感到好像生来就是为着来看看世界上那些事物动荡变迁的。只要合理地运用它们，对我来说无疑就是一种馈赠。”1991年，他受《独立报》委托，前往伊拉克拍摄萨达姆驱除库尔德人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此时，他已经有7年没有报道过战争了，他说：“我对《独立报》给我的这个诱人的机会早已梦寐以求了。但我希望不要在那里看到战火中受伤的儿童。这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让人无法忍受。我难道真的需要再次面对这些吗？”就像过去拍摄过的无数的战争一样，麦库林拍摄的库尔德人的图片一如既往的锐利和打动人心，但是，一切并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他拍下的那些有关动乱、暴行、死亡和破坏的令人痛心的图



反法西斯示威者在广场集会（上图和右图）

像无法阻止战争的继续，他通过自己的摄影对人类的苦难表示出来的极大同情和对战争的愤怒的抗议，也无法安抚和消除战争对人类造成的那些巨大伤害。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唤起那些可以结束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唤起更多人的悲悯之心，共同寻求一条和平宁静的道路。

麦库林成为继卡帕之后最卓越的战地摄影家之一。他的摄影多次获得世界性的大奖，其中包括1964年的“华沙摄影金牌奖”。1965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和1974年由美国杂志摄影家学会颁发的“特殊成就奖”。他的作品曾在科隆的世界摄影器材博览会、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和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等地展出。现为联系图片社一员的麦库林，继续他那乱世图像的敏锐捕捉和悲观无望的表达。

撰文 / 老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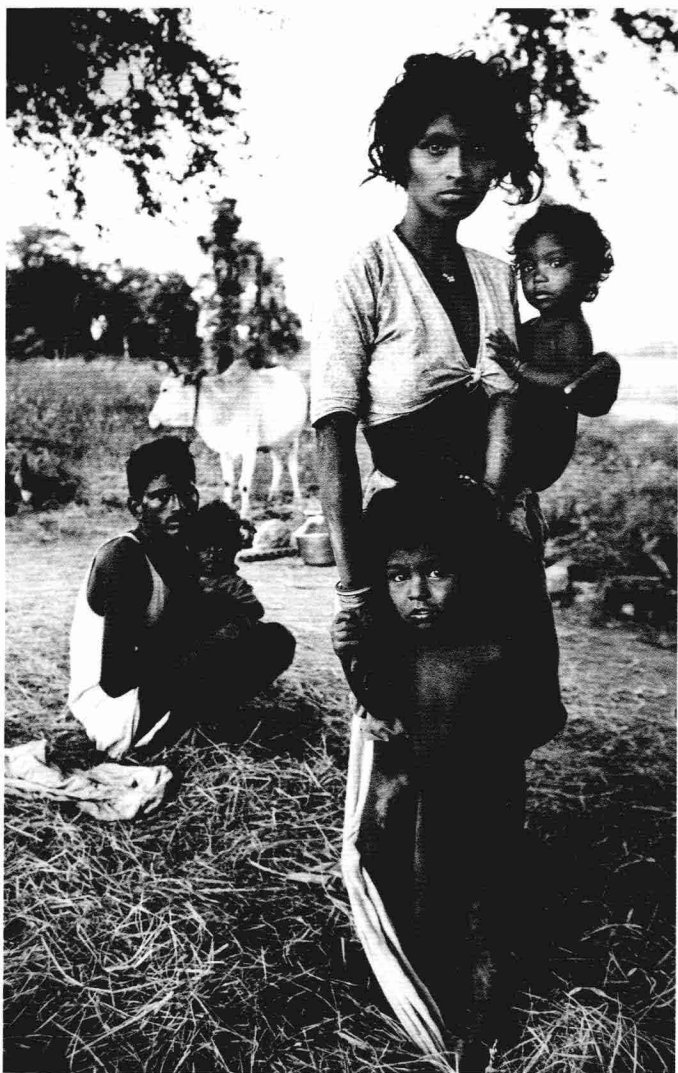
摄影家吉尔·卡洛（左）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的朋友死于1970年

唐·麦库林论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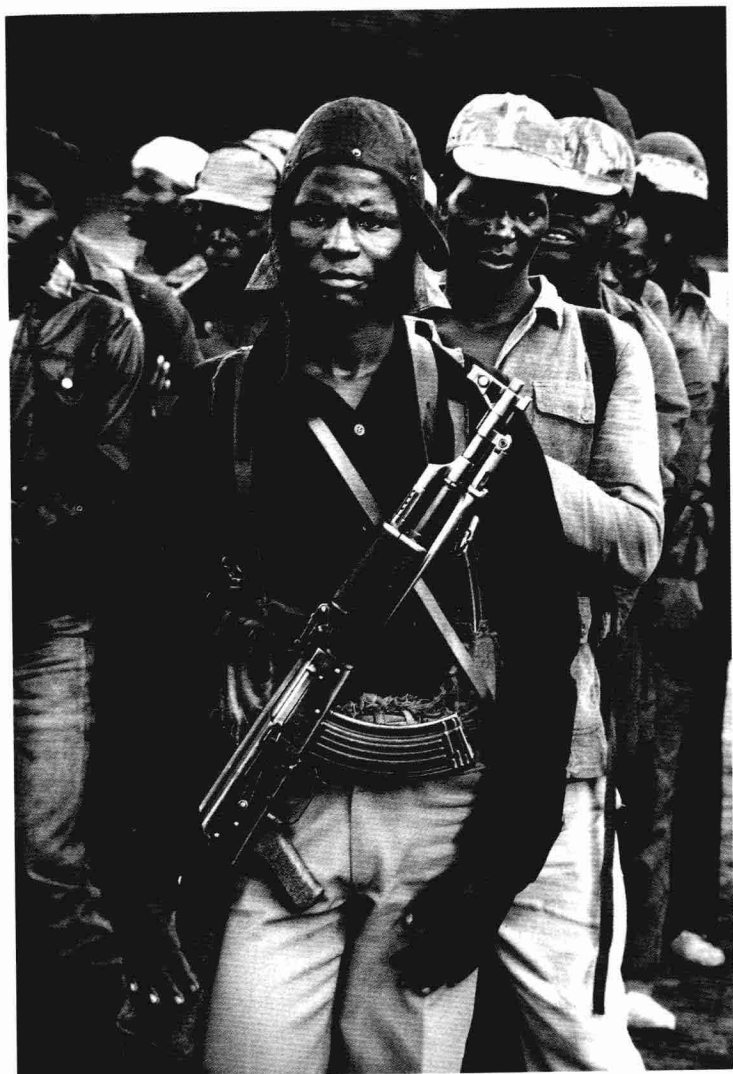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也不想改变。但是没有宗教，能有恻隐之心吗？再说，我为媒体工作，这就意味我摆布别人的感情，剥削别人对不幸、痛苦的反应，而同时我自己也被摆布，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有罪。对宗教，我有罪，对那些无助的人……我也深受良心谴责。当我行囊里带着拍好的底片，安全离去时，他们却在饥饿和战火边缘等死。我没办法再承受这种罪恶感，我不愿意再一直对自己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让这个孩子饿死的。”我要拍风景和花朵，我要活在和平里。

也许应该多表现毁灭、不幸以外的事。其实，这是我最早的想法，我原来不愿意做战地摄影——现在我没办法再做了。只是我发现拍摄和平更困难。拍战争不需天分，任何人都会拍一个在饿死的人。

当一个人看着我，像在说：“帮助我”，可是他说不出来，因为炮火刚炸掉他的下颌。我只能用眼睛回答他：“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但愿能帮你”。我还是把他拍下来。一边拍，一边觉得可耻。因为我不但没有帮助他，还加深他的痛苦。我在想，他是活不成了，他需要的援助来不了，即使来也太迟了，我能做的只是有尊严地去接近他——这只有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才可能，如果十来个记者你推我挤，围在一个受伤者身边，互相指责：“你破坏了我的画面。”那还谈什么尊



印度的一个农民家庭



津巴布韦的士兵

严？他们靠得那么近，让伤者连呼吸都困难。我看着他们，自问：“这些是什么人？”在贝鲁特，他们晚上都聚在酒馆里，讨论价钱，或者说：“如果我的照片上了封面，我请你喝香槟。”

报章里的照片是来自一连串的剥削：受难人、摄影师和读者。当我带着照片进报馆时，主编常会大叫：“真可怕！这可以做个很好的跨页！”或者说：“可怜啊，这些人，这是张非常好的封面！”我也玩他们的游戏。我只等着下次战争，这变成了一种毒瘾。

这些照片是记录，不是圣像，不是拿来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如果在萨巴（Sabfa）和夏提拉拍的照片（Shatila）的光线，让人想到圣经；如果其中的情景像戈耶的画，那不是我的错。我不是去拍圣像的，我只带回记录，也许以后可以避免这类惨事再发生。我不愿被当做艺术家，我们没有权以他人的不幸来制造艺术。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如此而已。但我不愿意再去拍战争。我要到街上，拍正常的人——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情不自禁地去找不幸的人。

面对当地的人，我们需要一点尊严。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抢骨头吃的狗——一抢的是他们的骨头。我努力控制脸上的表情，身体的姿态，甚至拿相机的样子，让他们知道了解这一天中他们承受的灾难。

暗房像一个子宫，我可以与外界隔离，将我的思想、血液、心灵的力量集中起来。有时，我的脚好像脱离地面，飘飘然起来。显影剂里的每一张影像都变得神奇，每一张洗坏的都成为心理负担。我洗得很少，一天很少超过5张。我也很节省底片，我也不用电动卷片马达。我出门三个星期，带回的胶卷不超过30卷。我尊敬底片，我相信这样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敬。你会说这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知道只要稍不留意，照片就会给我开个玩笑。放入相机的每一个胶卷，都有这个危险。相片就在那里，谁都能得到，但它不属于任何人。我尊敬它就像尊敬海洋，因为它比我大得太多了。有时候，我旅行归来，发

现底片模糊了，因为相机背面不密封而漏光或是其他缘故。我也不生气，不会把相机往墙上砸，只笑笑，对自己说：“这次她没有尊敬我。”

25 年来，我像是摄影界的麻疯病患者，记录不幸和苦难。如果出现这样的奇迹，将我治愈，便可以还我本来面目了。但我不相信这种奇迹：我看不出，罪恶感如何能以一张特别有意义的照片来抵销，这只不过是剥削受难者的另一个方式罢了。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积聚的底片，像浓缩的不幸，无法安安稳稳地待在那只金属盒子里。它们在空气中散布出一种不安，使我没办法像别人那样安心地坐着看书；使我焦躁、挑剔，老是在捡东西、擦东西、洗东西。不知道是哪里不对，总是紧张、无法自制。如果换了别人，恐怕已经发疯了。

大家以为精神病只有坏处，这是不对的。它可以让人承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忍受的事。使我免于精神失常的，是我的自我纪律：永远保持清醒，不丧失理性，一切都在我控制之下。因为我一向要掌握一切，这已经成癖。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让我失常了——而且也疲惫不堪。当我下了飞机，到了世界另一头，我实在很累——心理、生理都累，而这时我得立刻赶到第一线。我一向如此，已经出了名，我自己要这样的。

中东六日战争时，我只在耶路撒冷战役那天在场，第二天就搭机回国了。但是，我发现应该一直留到最后。1968年，在顺化城，我待了两个星期，Kippour 战争，我一直留到停火，虽然我一张好照片也没拍到，而且我的伙伴在戈兰高地被杀。到了飞机场，他们剥光我的衣服，让我弯在地上，检查我的肛门，看看我有没有企图夹带底片出境，我什么罪都受了：被屈辱、胁迫、殴打，还被扣上间谍的罪名。

暗房是个很折磨人的地方，因为讯息不是从底片直接印到相纸上去的，它要先经过我。有时我会半夜起来，到暗房去，打开盒子，再

